

试论《遵义新志》的学术意义 与现实价值

文 / 吴 帆



浙江大学西迁遵义地区办学期间，学校史地所张其昀教授曾主持编写过一部别具特色的学术型“地方志”，名为《遵义新志》，这本“新志”对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历史、地理、产业、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遵义新志》的出版不仅开创了近代新编地方志的先河，也对传统方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当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

一、《遵义新志》的成书经过与概况

《遵义新志》是由张其昀主编、浙大师生协力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张其昀，字晓峰，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地区一个书香世家，后来成为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地理学集大成者，张其昀是一名著名学者，也是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他也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优秀教授，为《遵义新志》的成功编辑出版做出过很大贡献。

《遵义新志》虽然主编是张其昀，但是发起编纂“新志”的则是浙江大学时任校长竺可桢。民国三十年（1941）七月二日，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其日记中写道：“现也有研究生九人，均已着手研究专题……余希望史地研究室能为

遵义、湄潭作一地方志”，竺可桢老校长高瞻远瞩，在郑珍等人编纂的《遵义府志》的基础上提出不同于传统地方志的编修体系，利用与时俱进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理论来编写一部“新志”，竺可桢老校长建议以史地系为主，成立专题小组，张其昀负责统筹，对遵义地区的土地资源、水力资源、气候条件、农业产业、人文因素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地考察，由此拉开了《遵义新志》这部著作编纂的序幕。

《遵义新志》的编辑人员除了张其昀先生外，还有多位浙大师生，主要有叶良辅、侯学煜、任美镠、丁锡祉、杨怀仁、熊毅、施雅凤、陈述彭、杨利普等人。当时“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地区的山间办学，条件艰苦，物资短缺，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部“新志”前前后后编辑了七年，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才付梓出版，其编撰经过十分曲折，历经种种艰辛，如今看来实属不易。虽然《遵义新志》在体系上已经做到了合理编排，但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遵义新志》是浙大师生在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编撰的，内容难免存在一些错漏。各个章节由不同的学者或研究生编辑，学术水平不尽相同，行文风格也各具特色，不过最终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新志”的编纂，得以付梓出版。

张其昀曾感慨道：“留遵义凡七年……记录颇丰”，这本书“计十一章……十七万言，附地图二十二幅”，内容涵盖多个方面，主要分为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两个部分，前六章主要研究了遵义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第七章至第十一章研究遵义地区的土地使用，农业经济、历史沿革等，全书体系清晰、层次分明。《遵义新志》的出版，是当年浙江大学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近代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上，也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书也为后来遵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成为遵义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

二、《遵义新志》的学术意义分析

《遵义新志》收录的材料涵盖广泛，主要涉及历史地理、产业经济等学科门类，这部“新志”对遵义地区的地质状况、历史沿革、农业土地生产等进行了详尽地研究与分析，其本

身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1、学术内涵

《遵义新志》这部书的《历史地理》这一篇章，编者将遵义地区两千多年发展的历史分为以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为代表的九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遵义地区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简述，该篇目的编辑人员在当时材料难以收集的艰苦条件下，结合实地考察结果，最终梳理出遵义历史发展脉络，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

从张其昀写在书前的引言可以推测，原书内容范围比成书更广，计划收录材料也更多元，成书未收录的文章以及仅存目的文章也值得我们研究。张其昀在序言中称：“此外另有论文四十篇，稿存本所，限于篇幅未及一一刊布，今附其目录于本书之末”，除了《遵义新志》现存的文本内容外，还有四十个已经完成的专题研究，没有收入志书的专题文章，从学术内涵与意义的角度来看，仍然十分优秀。如谭其骧先生当时撰写的《播州杨保考》，对当时在遵义地区统治八百余年的“播州杨氏家族”历史进行了研究，将杨保家族在播州地区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沿革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历史考证严谨，学术水平极高，是一篇优秀的历史学术研究论文。

2、学术意义

从学术意义方面来看，张其昀先生是基于他的“新方志”思想来主持编撰《遵义新志》这部“志书”。《遵义新志》在某段历史时期曾被命名为《新方志学举隅》，进一步说明了《遵义新志》在某种意义上是张其昀“新方志”思想的实践。所谓“新方志”，通俗来说，是现代地理科学和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他摒弃传统志书中关于职官、列传、星野等地方历史文化记载，转而采用新的科学方法，对地区进行研究，创作具有科学内涵的“新方志”。张其昀在他的一些论述中也反映出他所主张的“方志”与我国传统方志的不同，并梳理了传统方志、历史地理与“新方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张其昀在1932年出版的《人地学论丛》中说道：“区域地理的性质，就是中国古来的方志，可是这种方志有纯粹的科学精神做基础，所以叫新方志”，他建议传统的方志应改称地方史，与“新方志”分属不同的体例，张其昀的“新方志”学术思想对当时民国地方志书的修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遵义新志》的编撰出版，记录了遵义区域地理状况，其体例明显与传统方志不同，是一部典型的区域地理学的学术著作，其内容也较多强调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张其昀先生对中国学术界“区域地理学”的一次学术普及，让中国学术界对于“地方志”这一传统概念，有了新的研究方向。

自《遵义新志》付梓出版之后，中国国内有关区域地理学的研究，在张其昀的“新方志”框架下，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延伸。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遵义新志》看作是一部历史地理学论文集，围绕遵义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当时的浙江大学师生，作为外来迁至贵州省的高级知识分子，站在客观的角度观察当地，通过一部《遵义新志》的编撰，不仅对遵义地区有了一个理性认识，也为遵义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学术指引。《遵义新志》的编撰体现了浙大师生高度的学术修养，另外，《遵义新志》也反映了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办学时的精神面貌，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发扬学术精神，坚毅笃实，实事求是，为自身谋发展，为当地谋服务。充分发扬了浙大的“求是”精神，是浙大西迁历史上重要的见证。

三、《遵义新志》的现实价值分析

《遵义新志》作为一部反映近代遵义地区产业与经济状况的志书，虽然其编纂经历较为仓促，但借此书的编纂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以及书中的相关记载，对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遵义乃至整个黔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产业与经济方面

在产业方面，《遵义新志》中也提出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农业产业技术，为遵义民众提供直接指导。主编张其昀在引言中提到：“篇中关于遵义农业改良之若干结论，均本次之田间日验，实事求是……可供今后遵义地方建设之准绳”，《遵义新志》对农业的研究因地制宜，源自实地勘察，其数据和结论对遵义地区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遵义新志》对遵义的地理全面考察，立足当地环境，服务于生产实践，进一步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给遵义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茶叶是遵义地区的特色产业，遵义也是贵州重要的茶产业区域，其境内的湄潭、凤冈等县茶叶种植历史悠久，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在遵义湄潭的象山脚下建立了“中央实验茶场”，当时的浙大师生与“中央实验茶场”合作，因地制宜服务于当地茶产业，在四十年代研制推出了“湄潭龙井”和“湄红”两种新茶，给遵义地区的茶叶种植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如今的遵义是贵州著名的产茶中心、农业中心、桑蚕业中心，其地区经济发展在贵州处于前列，并在茶叶品质方面名扬海内外。除了遵义本身的资源丰富外，也与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师生在遵义地区的创新理论指导离不开关系。

2、城镇与人口方面

在城镇发展方面，《遵义新志》为战时遵义地区的人口

数量、聚落分布、人口密度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说明，为遵义后来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并指导了城市规划的部分内容。据《遵义新志》记载，抗战之前“遵义城区人口约5.8万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时，遵义地区“城区人口有十万人”，明显可见，在抗战时期，遵义地区城区人口增加了约两倍，城镇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除了自然增长的人口外，大部分为外地迁入人口。人口的增加，进一步促进遵义地区在战时的发展繁荣。

3、浙大校史文化方面

“国立浙江大学”自抗战爆发以来，历经曲折，先后进行了四次迁徙，耗时两年半，最终才在贵州遵义湄潭县安定下来。张其昀回忆浙大西迁时说到：“战时浙大辗转播迁，可以说是一首史诗”，浙大在西迁办学的过程中，不仅坚持自身高质量的办学水平，还服务于当地，为当地的发展提供帮助，学校不仅没有在西迁遵义过程中消耗殆尽，后来在杭州复校时，依然保持领先地位。《遵义新志》是“国立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期间所创作出版的一部作品，浙大西迁遵义与湄潭等地办学七年，《遵义新志》也编辑了七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浙江大学前校长路甬祥曾经说：“遵义、湄潭是浙大第二故乡”。《遵义新志》反映了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湄潭办学时的精神面貌，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发扬学术精神，坚毅笃实，实事求是，为自身谋发展，为当地谋服务。充分发扬了浙大的“求是”精神，可以说是浙大西迁历史上重要的见证。

总而言之，《遵义新志》对于遵义乃至黔北地区的影响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成果发挥的重要作用，它的实际应用价值影响更为深远，这就是《遵义新志》先进性的体现。《遵义新志》中的内容具有实用价值，书中记载的许多先进生产技术，经过实践的检验，为遵义地区的工农业发展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学者们在农业上为农民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指导，为遵义地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实用而又有效的理论知识。如今的遵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以茶产业、旅游业为依托，如何解决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成为遵义现在主要的发展瓶颈，因此，对人口和产业资源的把握是遵义发展决策中的重要环节。而《遵义新志》的主旨内容与之契合，因此书中的许多方法经验如今依然值得借鉴。

四、总结

《遵义新志》不仅仅是一本书，其背后承载着深远的意义，对当地的发展以及浙大本身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遵义新志》开创了近代研究性地



方志的先河，为新地方志的撰写树立了一个典范，后世地方志的撰写受其影响往往侧重提高文章的学术性，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并力求准确严谨。近现代新编地方志强调的“鸟瞰全局，溯古瞻今，揭示规律，评论得失，远瞩未来”的要求，也是从文章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上对新地方志的编写设立标准，亦可窥见《遵义新志》的深远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促进地区产业振兴、经济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做指导，而《遵义新志》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对遵义当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考察与总结，《遵义新志》的编辑出版，在当年浙江大学师生的齐心协力下，给遵义送来一部实用的“指导手册”，对遵义地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其利在当时，功在千秋。这为遵义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和理论基础，在今后遵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遵义新志》的作用将会越发凸显，相信能为遵义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继续提供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 [1] 张其昀，主编. 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 遵义新志 [M]. 成都：巴蜀书社，2012.
- [2] 喻朝碧，曹裕强，著. 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 [3]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浙江大学在遵义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

吴帆（1998—），男，汉族，安徽合肥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